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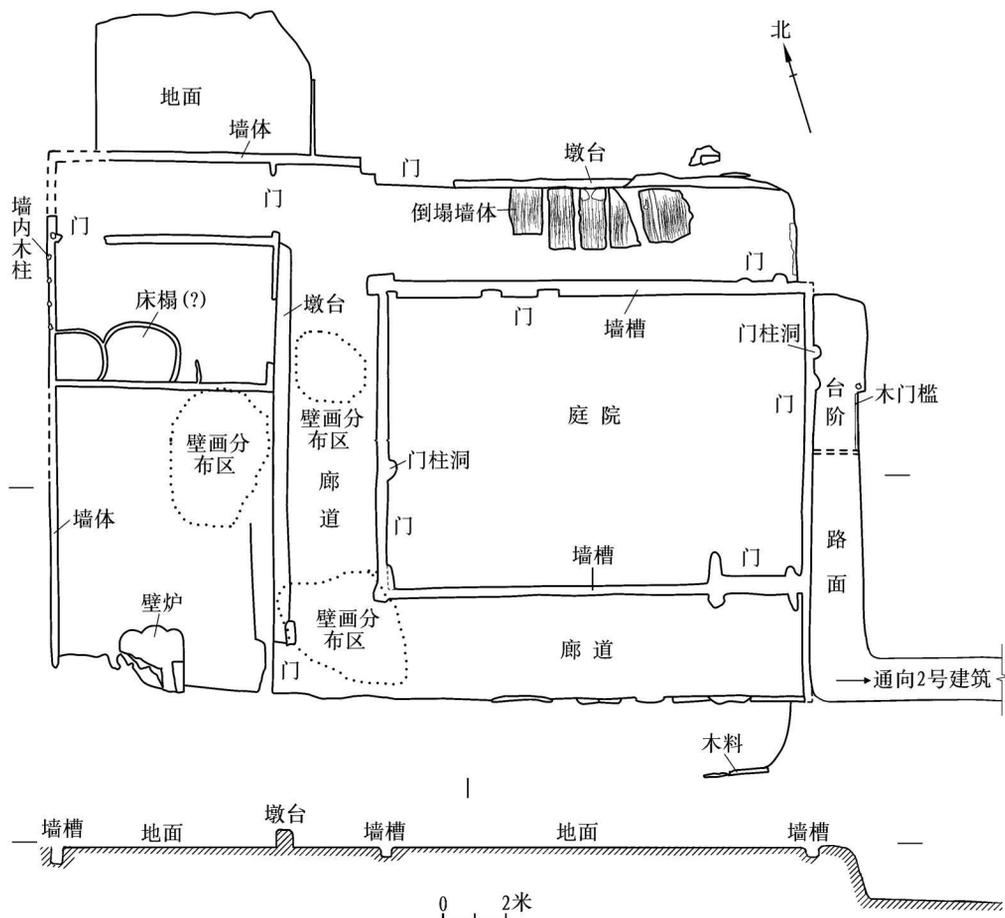
图二 2号、3号建筑遗址平面图

的西北,二者相距约5米(图二)。遗址埋藏于一处低矮的沙丘之下,除去地表厚1~2米的沙土层后,便暴露出建筑基址。

3号建筑的整个院落建筑在红烧沙土垒积的地基上,为庭院廊道布局,平面呈“凹”字形,东西长约26、南北宽24米。其东面有院墙,院墙外有狭长的土台,北端被损毁。东墙开一门,门外有二级台阶和木门槛,面向2、3号遗址之间的广场。遗址东南角有连接2号建筑遗址西北角的土基道路,宽约1.7米。院墙内为一长方形庭院,东西长13.38、南北宽8.4米。庭院的北、西、南三边有廊道环绕,廊道宽约3米,仅存墙体基槽。在北廊道的北墙和西廊道的西墙根部都保留有宽0.35~0.42、高0.08米的长条形墩台,可能用作座椅。南、北两侧廊道的东端都有门通向中间的庭院,门宽1.5~2米。在北廊道的南墙中部可能还开有一门通向庭院,宽约1.2米。北廊道北墙的西端开有一

门通向庭院之外,宽3.1米。西廊道的东南角有一门通向中间的庭院,门宽2.1米(图三;图版壹,1)。

廊道西侧为四开间的房屋,自南向北第一间呈长方形,长9、宽7米,东南角有一门与廊道相通,门宽约1.5米。北墙和部分西墙保存有高0.3~0.5米的墙体,靠近南墙的中部有一类似壁炉的用火台面(图四;图版贰,5),高0.4米,平面形状呈莲花瓣形,北侧三瓣保存完好,西侧一瓣残存底部。台面有大量红色、白色烧渣,其东侧为一短墙,残高1米。该房间面积最大,可能为伙房兼餐厅。第二间房长6.72、宽4.2米,南墙即第一间的北墙,北墙和西墙保存相对完好,残高0.4~0.8米,西墙墙体内可见一排直径约0.1米的木柱。房间的西北角有一门和第三间房相通,门宽约1.4米。靠近南墙和西墙的地面上有用细土埂围成的两个连接的半圆形区域,总长约4.1、宽约1.9米,其



图三 3号建筑遗址平、剖面图



图四 莲花形壁炉



图五 墙体残块

功能可能类似于床榻。第三间房长 6.72、宽 2.26 米，南墙即第二间的北墙，西墙破坏严重，北墙保存相对完好，残高约 0.7、厚约 0.35 米，东墙中部有一门通到廊道，门宽 1.04 米。第四间房破坏严重，西墙、北墙已毁，残存的地面遗迹长 6.85、宽 5.23 米，可

能为寺院主持起居、储物的房间。

遗址保存状况较好，墙体主要为草拌泥结构，高约 1、厚约 0.35 米，部分墙体内有木柱支撑。北部廊道中部靠近北墙处发现有成排倒塌的墙体，总长 5.8、宽约 1.9、厚 0.3 米(图五)。在墙体毁坏的地方保存有完

好的墙槽遗迹，宽约0.4、深约0.3~0.5米。整个建筑的活动地面用红烧土和黄土分层铺就并夯实，总厚度为0.15~0.2米。在南廊道内散落有不少屋顶建筑残块，推测其基本结构应该是先用木架搭建，再覆以芦苇，最后在上面涂一层泥。

在西廊道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南部第一间房东北角贴近廊道的范围内发现有较多的壁画残片，可知这些壁画残片应该与西廊道的西墙密切相关。遗址中除了木料、墙体等建筑材料和建筑残块外，其他遗物发现较少，不见生活用具。

寺院废弃以后，有人在整个建筑的西侧利用废弃寺院的房墙修建了新的房屋和牛羊圈，房屋现在仅余后代的木地。

二、出土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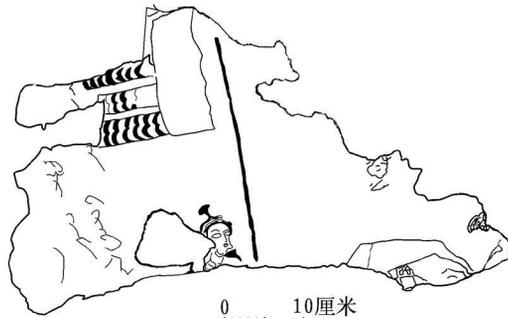
遗址内出土壁画残块约60余块，大多出土于西廊道内及其西侧，大小不一，估算总面积接近50平方米。

汉装供养人像壁画残块(10CDF3: 1)

残长60、宽40厘米。中心为一供养男子，头戴黑色头，身穿翻领衣，双手合十于胸前，侧身向左。男子面部饱满，耳阔目细，胡须稀疏。五官、颈部及双手以深赭色线条勾勒轮廓，余处施以浅赭色。袍为褐色，并饰黑色圆圈状图案，三角形翻领为白色，前臂衣袖为浅黄色。右肩及肘以下部分残缺。男子头部以上另有一组图案，似为跪坐人物的腿部，至少有一人，隐约可见赭色衣袍前摆、裤腿及黑靴。供养男子下部又有一男子，仅存黑色头及部分面部，应为另一供养人，其脑后隐现头下垂的软脚。二供养人右侧仅存一部分扇形图案，以青色为地，饰以褐色线条，其弧度和花纹皆与左侧供养人右肩部分相同，推测应为另一个供养人。二供养人身后以竖栏分隔成另一单元，其内似画有一虎向左侧卧，可见其黄色底纹及黑色条纹(图六；图版叁，1)。



图六 汉装供养人像壁画残块(10CDF3: 1)



图七 旌旗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2)

旌旗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2) 残长66、宽34厘米。仅存一人物头肩部分，梳棒形高发髻，顶端膨大为椭圆形，头部缠有白带，面部不清，穿赭色圆领衣。其左手持一长棍状器物，具体形制不明。人物上方有横向的飘带样图案，似为旌旗(图七；图版叁，2)。

人物形象左侧斜上方可以辨认出三行自上而下刻画的文字，惟第二行稍可释读，其余部分不易辨认。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吉田认为，文字有明显的8世纪粟特文特征。一般来说，如此随意刻画在壁画上的文字多是过路人的留言，内容为“某人到此礼敬……”。第二行破损处后似可读出\$ (mn) y “a Buddhist monk”。下面的字照例应是一个和尚的名字，似可读出 pyr' p' dr, 可恢复成梵文 Bhīrabhadra。北京大学东语系段晴教授认为，于阗语中多见-bhadra 为人名的后词，例如《于阗语高僧买奴契约》的买奴高

僧,名为 U day abadri“起贤”。其中-badri 正是来自梵语-bhadra。但是,在于阗语文献中,尚未见到叫做 Bhīrabhadra 的人。这三行残文是否是粟特语,目前尚无定论^[2]。

二站立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3) 残长 96、宽 80 厘米。残存二站立人物形象,右侧人物面稍倾向右侧,头戴花冠,络腮胡,右手执物于胸前,左手执披帛于胯侧,身穿蓝色衣,白色裤,黑色长靴,作行进状,背后有赭色椭圆形背光。左侧人物着赭色衣,左手置于胸前,背后有黑色背光。二人物下方有一长条形浅黄色平台(图八;图版叁,3)。

古藏文题记及人物头像壁画残块(10CDF3: 4) 残长 51、宽 38 厘米。残存一人物头像及部分藏文题记。头像残存四分之三,右侧视,头勒白色缠头,发、须、眉以褐色勾勒线条,染赭色,面部填以肉色,络腮胡(图九;图版叁,4)。脸部前面刻古藏文一行,前一个词仅存后加字 ga 和再后加字 sa 二字,再后两个字可完整拼读为“can”,意思为“具……者”,具体含义不明,大概为人物名称。

人物头像壁画残块(10CDF3: 5) 残长 28、宽 23 厘米。为一男性形象,头戴冠或缠头,头发额前中分,以金色丝带束成环状垂于颈后,面目清秀,下眼睑突出,嘴上有髭,下巴有须。以赭色勾勒面部及颈部轮廓,余处留白。着赭色翻领上衣,三角形翻领为黄色(图版壹,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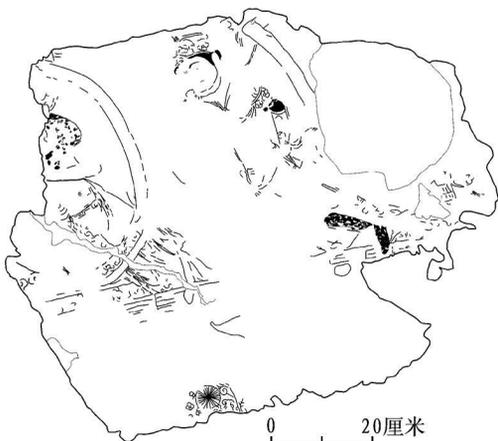
2)。

人物头像壁画残块(10CDF3: 6) 残长 28、宽 24 厘米。为一男性形象,头上有缠头,头发额前中分,颈后垂有发束。五官以深赭色勾勒,面部染以赭色,下眼睑以双线勾勒,嘴上有髭,唇下及下巴有须(图版壹,3)。疑为吐蕃人物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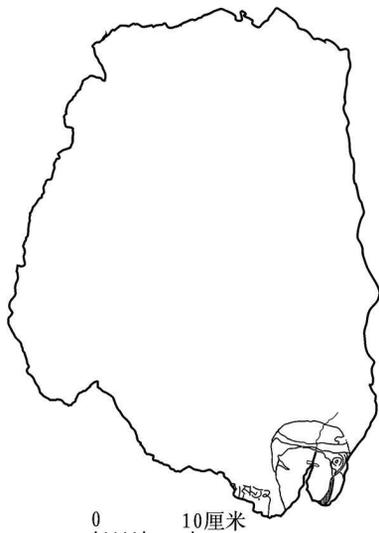
跪坐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7) 残长 49、宽 39 厘米。右侧为一跪坐人物形象,着赭色长袍,其左手下垂,似执物,双膝跪坐,着黑靴。残块左下方有赭色、蓝色条纹相间的方毯样饰物,其上有竖起的深色宽带,似为一背光局部(图一〇;图版肆,1)。

合掌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8) 残长 37、宽 35 厘米。仅存一供养男子面部及胸部,其侧身向左,面部饱满,以赭色勾勒五官及颈部轮廓,余处未染色,下眼睑为双线勾勒,嘴上有髭,唇下及下巴有须。双手合十于胸前。着三角形翻领衣,以赭色为地,饰以蓝色大团花图案(图一一;图版肆,2)。

僧侣头像壁画残片(10CDF3: 9) 残长 38、宽 22 厘米。残存一僧人头部。头发染浅蓝色,面部以深赭色勾勒轮廓,余处染赭色。头部后方有赭色及浅蓝色纹饰,具体造型不明(图版肆,4)。



图八 二站立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3)



图九 古藏文题记及人物头像壁画残块(10CDF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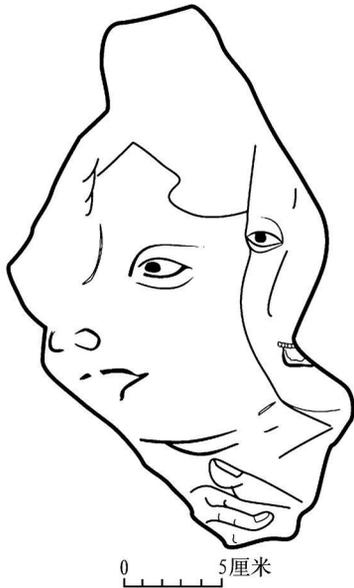


图一〇 跪坐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7)



图一一 合掌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8)

女性头像壁画残块(10CDF3: 10) 残长 28、宽 17 厘米。残存二女性形象, 右侧女性面部以深赭色勾勒轮廓, 面部染赭色, 高鼻凸目, 双手交叉拱于胸前。左侧女性面部未染色。两女性面部皆饱满圆润(图一二; 图



图一二 女性头像壁画残块(10CDF3: 10)

版肆, 5)。

跪拜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11) 残长 90、宽 45 厘米。中间为一人物双手合十, 侧身跪坐于一台座前, 上身赤裸, 戴项圈, 着短裤。台座为方形, 饰赭色勾连纹图案。台上似坐二人物, 左侧一人着赭色裙, 双脚交叉。右侧一人可见下垂的黑靴。跪坐人物后方偏下为另一人物形象, 面向右, 其头顶正上方有一块赭色饰物及黑色长杆。残块最左侧残存一人物面部(图一三; 图版肆, 3)。

线描女性头像壁画残片(10CDF3: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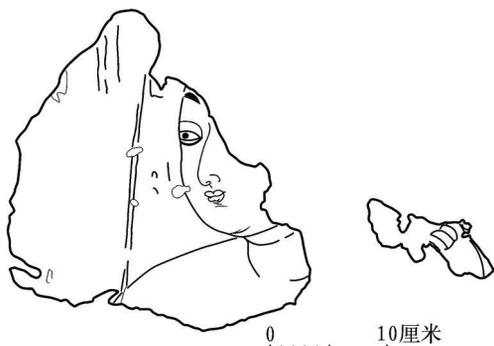
残长 27、宽 22 厘米。仅存一人面部, 侧向右。以赭色勾勒轮廓, 下眼睑为双线勾勒, 未染色。似为一女性(图一四; 图版贰, 1)。

执物男子壁画残块(10CDF3: 13) 残长 45、宽 32 厘米。残存一男子头、胸部分, 左侧向, 面部饱满, 以深赭色勾勒轮廓, 下眼睑以双线勾勒, 嘴上有髭, 左手擎于胸前, 似执物。着圆领袍, 白色地饰深蓝色十字形图案。其右侧以竖栏分隔, 右方为赭色地蓝色团花图案(图一五; 图版贰, 3)。

人物头像壁画残块(10CDF3: 14) 残长 13、宽 10 厘米。仅存一物左侧面部, 以深赭色勾勒轮廓, 面部染赭色(图版贰, 4)。



图一三 跪拜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11)



图一四 线描女性头像壁画残块(10CDF3: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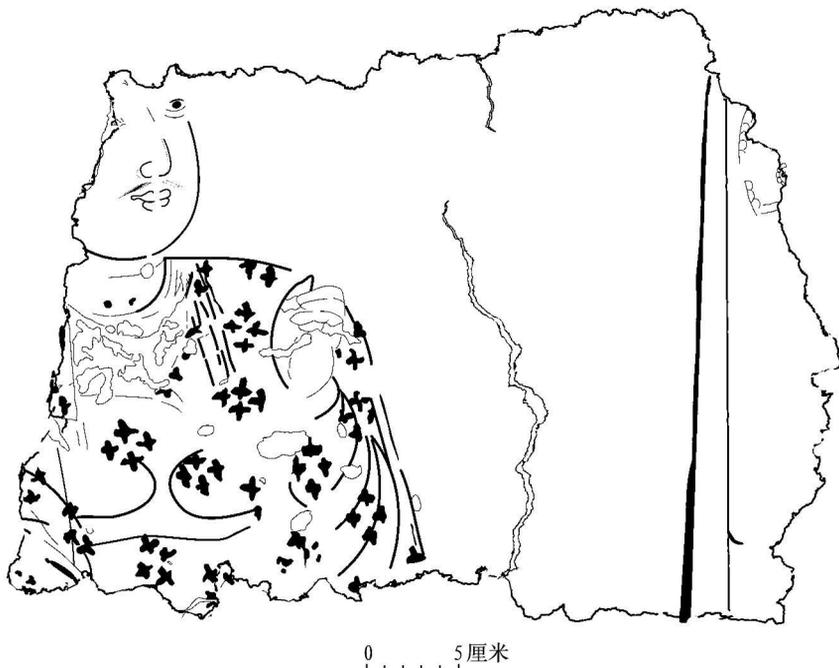
托物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15) 残长 39、宽 38 厘米。残存一人物形象, 稍侧身左向站立, 面部饱满, 面、颈部以赭色线条勾勒, 唇上有髭, 龋牙微露。耳佩 , 项戴圈, 臂饰钏。着圆领赭色长袍, 腰束带, 项圈及腰带饰环形璎珞, 腰带上悬一短剑于腹前。披帛自右上臂垂下, 以右手执于体侧。左手擎一带柄器物于胸前。圆形头光中间为绿色, 有云气飞升, 次为灰白色和赭色。椭圆形背光中间为蓝色, 次为灰白、黑色, 最外以赭色线条勾勒, 背光右侧有赭色和蓝色莲花状装饰(图一六; 图版贰, 2)。

二并列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16)。残长 85、宽 55 厘米。残存两个并列的人物形象, 左侧为一男性, 盘腿坐于赭色身光中, 有蓝色圆形头光。身稍向左侧, 头戴花冠, 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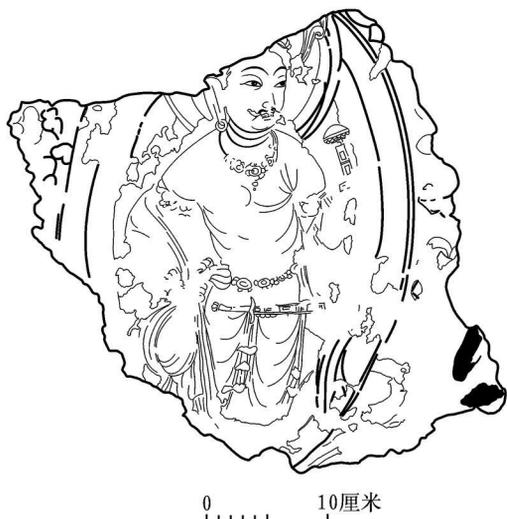
两侧有飘带飘出。双目凝视前方, 牙齿微龋, 下颚有络腮胡须, 双手捧物于胸前。耳佩 , 项戴圈, 臂饰钏。着圆领短袖灰白色长袍, 腰束褐色带, 蓝白色相间的系带飘于两侧。右侧人物似为女性, 站姿, 背光为椭圆形, 外圈为赭色和深褐色, 内部填以绿色, 头光为灰白色圆形。头戴花冠, 冠两侧有飘带飘起, 发髻高束, 面目清秀, 右手捧物于胸前, 左手自体侧外伸, 蓝色披帛自头顶垂下, 绕双臂后飘于体侧。着圆领短袖赭色长袍, 腰束灰白色带, 足部有蓝色帛带飘出背光。女性形象右侧还有其他人物图像, 仅存部分背光外轮及部分披帛(图版伍, 2)。

古藏文题记残块(10CDF3: 17) 残长 40、宽 36 厘米。残存刻画古藏文一行, 内容为“vdi A ma ch btsan legs”, 藏文下有一刻画图案, 似为一马匹(图版伍, 3)。古藏文经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夏格旺堆释读, 意为“这(为)阿妈恰赞列”, 其中“vdi”中的元音“i”为反写体, 具有较为明显的吐蕃王朝时期古藏文的特征。

于阗文题记残块(10CDF3: 18) 残长 25、宽 35 厘米。在白色墙面上残留一行墨书婆罗谜字母于阗语题记, 但残缺严重, 无法读出整句(图版伍, 4)。段晴教授将可读出的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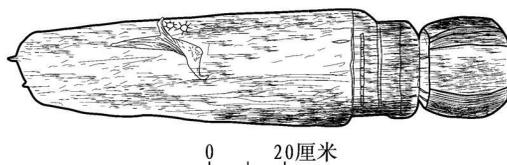
图一五 执物男子壁画残块(10CDF3: 13)



图一六 托物人物壁画残块(10CDF3: 15)
分释读为: Sa' krritta stä. "……所做"。

三、出土遗物

遗址南侧廊道外侧有木柱 1 件(10CDF3: 19), 长 1.32 米, 直径 0.3 米, 一端旋刻成多重束颈式柱头, 保存较为完好(图一七; 图版伍, 1)。



图一七 木柱(10CDF3: 19)

四、结 语

托普鲁克墩 3 号建筑遗址的平面布局非常具有地方特色, 其中的广场式庭院和僧房都是首次发现, 这种庭院与塔克拉玛干地区现代建筑中的“阿伊旺”庭院极为相似, 因而成为研究当地建筑发展史的最新发现, 也丰富了塔克拉玛干地区佛教建筑的形制。3 号建筑与 2 号建筑遗址距离仅 5 米, 其间有土基道路相连, 而 2 号建筑的北侧有门道及台阶与此道路相连, 可见两个佛寺建筑原本为一体, 可能是同期建成, 并共历兴衰。其多开门的回廊围绕开阔的方形庭院, 配置以僧房、灶舍等, 大致完备了整个寺院的使用功能, 成为寺院主持和僧人生活起居、会客、学习、讲经、藏经和举行一些重要聚会活动的

场所。

2号建筑为整个寺院的主佛殿，是寺院僧人与信众礼佛和举行佛教法事的重要场所。从其平面布局来看，是典型的带走廊的回字形像殿佛寺，尤其是内殿的四角各有一个像座，可能用于安置天王像，同样的形制见于达玛沟乡的丹丹乌里克遗址 II. i 佛寺^[3]和民丰县的安迪尔遗址 E. I. 佛寺^[4]，而后者出土有大量的吐蕃文文书和刻画，并有唐开元七年（公元 719 年）题记，斯坦因判断为 8 世纪中期遗存，为这一类型的佛寺始建年代提供了重要参照。3 号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过程，应该与 2 号建筑遗址同步。

3 号遗址中出土的壁画图像具有比较突出的特点。从壁画用笔来看，较多体现了于阗画派“屈铁盘丝”式线描的艺术风格。壁画中所描绘的一批供养人像为 1、2 号佛寺建筑遗址所未见，这对于我们了解该地区的社会文化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着头帽的唐装男性图像尤为珍贵，类似的供养人形象在邻近的丹丹乌里克殿堂建筑遗址中也曾有发现^[5]。丹丹乌里克为唐朝驻军的“杰谢镇”所在，是唐朝人在该地区活动相对密集的区域。唐人的形象出现在该地区的壁画中，一方面反映了唐人在经营疆域过程中对佛教信仰的执著，同时也折射出其在文化上对于该地区所具有的影响力，因此也不难理解于阗国王李圣天“衣冠如中国”^[6]的宗属认同。

壁画上发现的古藏文题记具有明显的吐蕃王朝时期古藏文特征，为判断该遗址的使用年代和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了解吐蕃占领时期和田地区佛教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线索。至少有三块壁画残块上的头像，从服饰特征上来看很有可能是吐蕃人形象。古藏文题记及人物头像壁画残块（10CDF3：4）中男子头像旁有古藏文题记，该男子头勒缠头。有 2 件人物头像（10CDF3：5、6）都有缠头装，颈后垂环形发

辮，前者胸前有三角形翻领，这些都是典型的吐蕃时期的服饰特征。类似的吐蕃人图像多见于敦煌莫高窟壁画、藏经洞绢画和吐蕃时期的棺板画，在西藏西部 13 世纪之前的石窟寺壁画中仍可见到，但从技法和风格上来看，3 号遗址中的吐蕃人形象显然更接近于以敦煌为中心的东部地区。

吐蕃势力在 7 世纪下半就进入于阗，8 世纪下半叶完全占领，他们驻扎吐蕃部落，并在神山（麻扎塔格山）建立了要塞，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不少遗址中都留下了足迹。一般认为于阗在公元 866 年摆脱吐蕃控制，但吐蕃在该地区文化上的影响被延续下来。从敦煌发现的文书来看，当时于阗朝廷中不仅藏文和于阗文同时使用，而且还有一些吐蕃人仕宦其国^[7]。公元 1006 年，尉迟家族统治下的于阗为来自喀什的黑汗王朝所征服，此后进入了穆斯林化突厥化时期，佛教文化遭到彻底毁灭，达玛沟佛寺遗址的破坏也被归因于这一历史事件^[8]。而这一时期正是西藏本土佛教遭遇灭法之后的复兴阶段（后弘期初期），在西藏西部地区尚未形成一个足以影响周边区域的佛教中心，从文化面貌上来看，达玛沟佛寺遗址中所出现的西藏佛教因素与后弘期西藏西部的佛教文化有明显的脱节，反而更加接近于 8~9 世纪吐蕃时期的特征。根据目前的研究，敦煌在吐蕃统治时期曾经一度兴起吐蕃密教^[9]，达玛沟佛寺遗址所出的擦擦与青海都兰地区吐蕃时期遗址中出土的擦擦也非常相似^[10]。也就是说，2 号和 3 号佛寺建筑中所出现的西藏佛教的因素，例如擦擦和吐蕃供养人形象，实际上更多地反映了吐蕃时期佛教的发展状况。它们或者是吐蕃人占领于阗之后所留下的遗迹，或者与朗达玛灭法之后逃入于阗的吐蕃僧人相关。作为从西藏佛教前弘期到后弘期过渡阶段的遗存，其研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巫新华，参加发

掘的人员有巫新华、赵慧民、郭物、艾则孜、史燕、木塔利普阿布拉等，现场保护人员为李存信。

执笔者 郭物 仝涛 巫新华
赵慧民 史燕 艾则孜

注 释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
- [2] 段晴根据吉田 来信整理。
- [3]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pp. 236- 303.
- [4] 同[3]pp. 421- 430.
- [5] Ch. Baumer, Dandan Olilik Revisited: New Findings a Century Later, *Oriental Art*, XLV. 2, 1999, pp. 2- 14.
- [6]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
- [7]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第23页,上海书店,1993年。
- [8] 同[1]。
- [9] [日]田中公明:《敦煌密教と美术》,京都法藏馆,2000年。
- [10] 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ンタ編,中国・青海省におけるシルクロードの研究。奈良:なら・シルクロード博記念国際交流財団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ンター,2002。図版32,図版33。

(责任编辑 苗霞)

○信息与交流

《山东白陶佛教造像》简介

《山东白陶佛教造像》由博兴县博物馆、山东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本,有正文136页,约16万字,文后有彩色图版80版,定价160元。

北朝小型素烧佛教造像是以瓷土为原料烧制而成,主要出土于山东省境内,是山东特有的佛教造像种类。1976年在博兴龙

华寺遗址中首次发现,其后在临朐白龙寺、高青胥家庙遗址陆续出土。山东省博物馆对山东境内收藏的素烧佛教造像和相关遗址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并对素烧造像的分布、性质、来源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为佛教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萧 玫)

本期要览

新疆策勒县达玛沟3号唐代佛寺建筑遗址发掘简报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策勒县达玛沟乡托普鲁克敦3号佛寺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3号佛寺建筑是一处起居、学习、论经的综合性建筑,其中首次发现的广场式庭院和僧房为研究当地的建筑史提供了新资料。遗址内出土的壁画,反映了8~9世纪唐人和吐蕃人对和阗地区的影响。

江苏扬州市宋大城北门遗址的发掘 2003~2007年,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对江苏扬州宋大城北门遗址瓮城西区和水门北段、瓮城东区、主城门和水门南段等先后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唐至元明时期的砖瓦、陶瓷器、铜镜、钱币、料器、石碑等遗物。宋大城北门遗址的发掘,基本揭露出了南宋时期北门和北水门遗址的全貌。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金代壁画墓 1990年,淄博市博物馆等对淄博市博山区一座金代砖室墓进行发掘。墓葬由墓门、甬道、主墓室等构成。主墓室内墓壁及墓顶皆有彩绘的图案和壁画,随葬品有瓷器等。根据墓葬内题记可知该墓年代为金代完颜永济大安二年,墓主为有西域胡人血统的地方官吏或富商。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以及壁画都反映了女真和汉文化的融合。

论商周时期青铜簋的铸型技术 青铜簋是商周时期重要的器类,在约1500年的使用时间内,簋的形制变化多样,其变化既有铸造技术影响,又有社会需求的作用。讨论了簋的器形、纹饰、技术与社会需求的相互关系。簋的铸造技术大体可以折射出一般青铜容器作为礼器在不同阶段与生产技术及社会背景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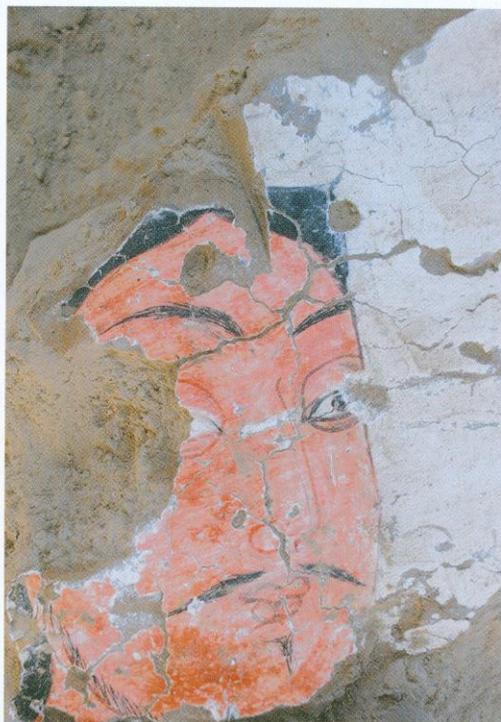
金代女真贵族墓汉化的再探索 通过对金代女真贵族墓的葬制、石象生定制、碑制的规制等汉化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了解了金代女真贵族的汉化倾向在金代中后期不仅表现在以皇陵、石象生、碑制等为代表的墓葬形制上,在以葬制、埋葬方式、墓内陈设及随葬品等为代表的葬俗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并且由早期的较少汉化因素到中后期的飞跃式的转变。



1. 3号佛寺建筑遗址（南→北）



2. 人物壁画（10CDF3：5）



3. 人物壁画（10CDF3：6）

新疆策勒县达玛沟3号佛寺建筑遗址

图版贰



1. 线描女性头像壁画 (10CDF3 : 12)



2. 托物人物壁画 (10CDF3 : 15)



3. 执物男子壁画 (10CDF3 : 13)



4. 人物头像壁画 (10CDF3 : 14)



5. 莲花形壁炉 (北→南)

新疆策勒县达玛沟
3号佛寺建筑遗址

新疆策勒县达玛沟3号佛寺建筑遗址壁画



1. 汉装供养人像 (10CDF3 : 1)



2. 旌旗人物 (10CDF3 : 2)



3. 二站立人物 (10CDF3 :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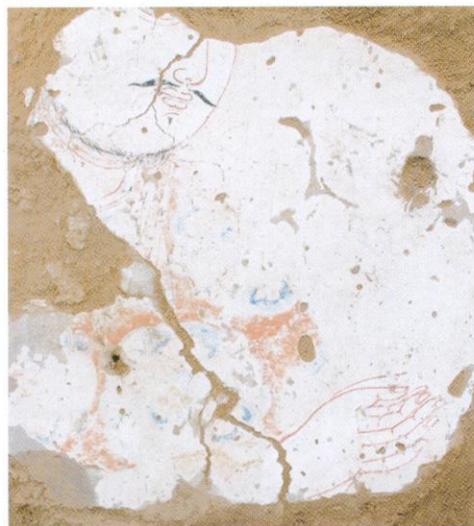


4. 古藏文题记及人物头像 (10CDF3 : 4)

图版肆



1. 跪坐人物 (10CDF3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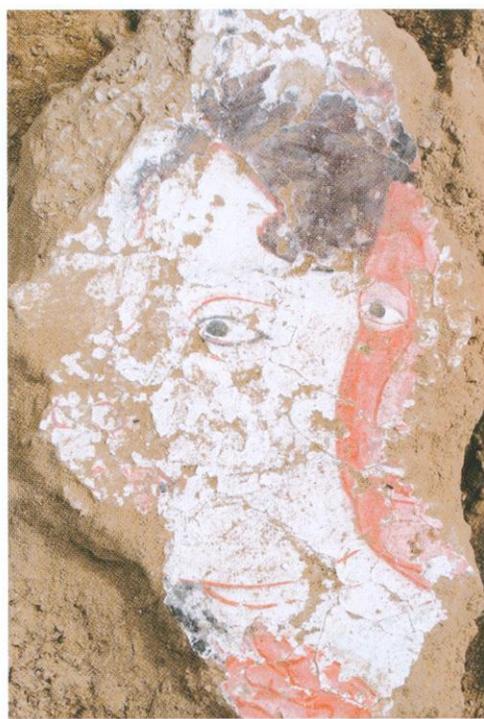
2. 合掌人物 (10CDF3 : 8)



3. 跪拜人物 (10CDF3 : 11)



4. 僧侣头像 (10CDF3 : 9)



5. 女性头像 (10CDF3 : 10)

新疆策勒县达玛沟3号佛寺建筑遗址壁画



1.木柱 (10CDF3 : 19)



2.二并列人物壁画 (10CDF3 : 16)



3.古藏文题记 (10CDF3 : 17)



4.于阗文题记 (10CDF3 : 18)